

目 录

CONTENTS

我的教师梦..... 3

我现在退休了，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，真是想想要哭，很多次让你要哭，想想又要笑，很多事让你笑，这就是生活的真实，教师生活的真实。我们正视它，又永远摆脱不了它，形成生命的一种缠绕，而生命的真实意义就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。

我为什么“屡战屡挫，屡挫屡战” 23

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长远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。我愿意为教育献身，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我愿意做民间教育改革的支持者与参与者。我愿意为农村的文化、教育建设贡献人生之余力。

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 35

教师的生命是和儿童/少年/青年的生命共生互

动的；而后者正处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最为纯真、最接近人的生命本原、最具活力也最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阶段。中小学教育的一个基本职责就是呵护中小学生的成长之美，维护他们成长的权利，培育青春精神。这个培育的过程会反过来滋润教师的生命而使之永葆青春。这是中小学教师生存方式所特有的幸福。

我理想中的大学教育 79

大学的教授、学者应该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和理想，以及作为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的追求，而绝不是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；更要防止自身成为利益集团。这样才能保持精神的独立和思想、学术、行为的特立独行，也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、创新，文化和价值的真正重建，才可能使思想、学术的创造成为社会的“公器”。

我的书院教育梦 111

在人群的和谐与人和自然的和谐气氛下，人的生命就进入一个沉潜的状态，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与状态下，人才能尽情地享受读书之乐，切磋学问之乐，同时思考生命、宇宙、人生、人性、中国、世

界、人类的大问题，以尽情享受思想之美，进入真正的教育与学术的境界。这是书院教育的魅力所在。

追求文、理的融通 131

知识面的拓宽，同时意味着人的视野、胸襟、精神境界的扩大，就可以发现各类知识，及其所反映的人的内、外世界的万般景象的内在联系，从而达到一种“通”——是思想的“通”，也是知识（学问）的“通”，这才是求知治学的高境界。

漫说“大学之大” 147

所谓大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里面，活跃着这样一批沉潜的生命、创造的生命、酣畅的生命和自由的生命。以这样的生命状态作底，在将来就可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大生命，这样的人多了，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民族，以至为整个世界，开创出一个大的生命境界：这就是“大学之为大”。

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181

我的老师王瑶先生甚至要求我们：每一篇重要的论文、著作都要做到别人再做同样或类似的课题，都绕不开你，非要参考你的文章不可，因为它

代表了一个阶段、一个时期的研究的最新水平。这都是在要求研究的创造性。

沉潜十年 195

一定要沉静下来，即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，着眼于长远的发展，打好做人的根基、学术的根基，而且要潜入下去，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，历史的最深处，学术的最深处。

我的农村教育理念和理想 209

我们的教育成了“升学的教育”，也就是说，既脱离了生活，也脱离了青少年的成长，唯一的目标，就是升学。因此，我们的乡村教育，是与乡村生活无关的教育，是完全脱离中国农村实际，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我国基本国情的教育，是根本不考虑农村改造与建设需要的教育，也就是说，农村完全退出了我们的乡村教育以及整个教育的视野。

他们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 239

对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，我们是欠了债的。什么时候，打工子弟可以随便参加城市里的任何文化、教育活动，以至不必为他们单独举行这样的竞赛，我们大概才能心安。

承担，独立，自由，创造

——我们要追寻的教育精神，知识分子精神 …… 253

生活里边有没有“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”，有没有“不可夺”之“志”，这是一个关键、要害：有了，你的心就有了着落，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，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，于是，就总要有所在意，有所守护；没有，心无所系，精神无所寄托，你就没着没落，既无法安身，也无以立命，也就不在意什么，一切都无所谓，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。

后 记



我的教师梦

2004年4月14日，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
“附中论坛”上的讲演

我作为附中的一位教师上课已经一个月了。课程快要结束了，最后借此机会向老师们作一个汇报。我今天想讲的是，“我的教师梦”。

奋斗几十年，为圆一个童年的梦

我这次来附中实际上是为了圆一个梦。2002年我从北大退休的时候，有学生问我退休后干什么，我说我退休后第一件大事是要回贵州一趟，因为当年我在贵州教了18年的书；第二件大事是到附中来。去年到今年总算干完了



教师工作非常重要，他是影响青少年的，而青少年正决定着国家、民族的未来。这是一种权力，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师的权力

这两件大事情。回归附中，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师梦。前几天我和中学同学聚会，一位女同学谈起一件往事：1956年我们毕业时，全校举行过一次以“我的梦想”为题的演讲比赛，我获得了第一名，题目是“我的儿童文学家梦”；第二名就是这位女同学，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乡村女教师，但梦的实现却非常曲折，1956年做梦，一直到了“文革”之后，才勉强圆了这个梦。也就是说，为了做一名中学教师，竟然奋斗了几十年。我听了自是感慨万端，想起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，也有过一个梦：回附中当教师。当时我在贵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书，想调回南京，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梦想。而且就是在贵州，我要求做班主任，也被拒绝了，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，没有资格当。“文革”中，这就成了一条罪状，说早就看穿了你想争夺青年的“狼子野心”。你看，在中国想做一位教师，竟有这么难！后来我想，不让我当教师的人也有他的道理，说明教师工作非常重要，他是影响青少年的，而青少年正决

定着国家、民族的未来。这是一种权力，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师的权力，于是，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师梦，就不能不奋斗几十年。

说起来，最早做这样的梦，还是在我小学五年





级的时候，当时我是中央大学附小（现在的南师附小）的学生。学校出墙报，有一个醒目的标题：“长大了做什么。”我还记得教我们美术的杨宏毅老师画了好多画：飞行员、教师、科学家、工人、农民，等等。然后每个同学在相应的栏目下填自己的名字，我当时填的就是教师。我第一次做教师也是在南师附小，那时学校受陶行知、陈鹤琴的影响很大，号召学生当“小先生”。解放初期还有好多儿童是流浪儿，我们就把他们聚集起来，办小先生学校，由我当校长。我的印象很深——班主任吴馨先生，有一天突然对我说：钱理群，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，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。我当时都吓坏了，连忙问：老师怎么当啊?! 吴先生看了我一眼说：你自己想吧。说完就走了。后来我才懂得，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：对你表示一种信任，你自会产生自信，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，而这正是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。后来我果真鼓起勇气当了这个小先生学校的校长，而且干得很不错。我现在还记得，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，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，上面写着“送给敬爱的钱老师”几个字。也就是说，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就被称作“钱老师”了，一直到现在还是“钱老师”，并且颇以这样的称呼为豪。

在贵州初为人师，找到了生命的价值

我真正当教师，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。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。你想我



后来“文革”中“对学生太热情”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

从北京一直下到边远的贵州，又是1960年的大饥饿的年代，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，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。想走走不了，想考研究生，又不让考。怎么办？我当时作了一个选择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也可以叫自我设计，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。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。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、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。我一分析，不管环境多恶劣，反正我是教师，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教师。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。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，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，需要等待的，要作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。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师附中教书，第二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，讲“我的鲁迅观”。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。当时年轻，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不让我当班主任，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：新学生一来，我就先看学生的入学照片，把他们全都记熟了，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，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，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，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辅导。——后来“文革”中“对学生太热情”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。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、踢足球，完全打成一片。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，但却害了学生。“文革”开始时到处挖“三家村”，我们学校就挖了以我为首的四五个“三家村”：有和我踢球、爬山的，有和我一起编墙报的，等等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，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，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



生，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 18 年，更难度过“文化大革命”这一关。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、生死之交的。所以后来到了北大，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。

我有两个精神基地，一个是北大，一个是贵州，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

我常常说我作为一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，一个是北大，一个是贵州，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。我去年去贵州讲学，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，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住处，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，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，他们说，“我们毕业以后不仅是卫生业务上的骨干，同时我们的文章也写得很好，很受领导重视，这得感谢你当年对我们语文能力的训练”。这倒是真的：这批学生是调干生，他们已经是国家干部，大多从事基层卫生工作，因为文化程度低，才选调进学校念书，入学时只有小学毕业水平，我从初一语文教起，一直教到高三，确实把他们带出来了。但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，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考上了研究生，就离开了这批学生。

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：要到北大讲鲁迅，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。而直到 1978 年，也就是我 39 岁时，才被允许考研究生，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。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 18 年：从 21 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，我就利用业余时间，研读鲁迅作品，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。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，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。有人问我，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，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，你会怎么样？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



究上得到发挥，但我还是会安心地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文教师，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。

我首先是一个教师，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

对于我来说，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。如果真要惩罚我，最有效的，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

实际上我现在还是教师，只不过是在大学任教而已。更准确地说，我现在有两个身份，一是教师，二是学者；但对于我来说，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，我在很多场合，都反复强调，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。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，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。我写过一本书，题目就叫“人之患”，就是喜欢做教师，好为人师。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，有一种癖好，我走到任何地方，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。对我来说，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，有天大的烦恼，一和年轻人聊起来，就什么都忘了。如果真要惩罚我，最有效的，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。

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了什么程度：仅仅在北大教书、到许多学校讲学都满足不了我的教师瘾，我还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全国各地的读者“聊天”，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。因此，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，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。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。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来信，写信的人表达的是对北大的一种向往，我就很热情地寄了一本我编的有关北大的书给他。于是他又给我写信，说：



我想，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伪装什么，今天在我收到你寄来的书时我哭了。原来幸福时也可以流泪，而且这种感觉很美，很美。没有想到你竟然也记得我们，因为我们之间近似于陌生人。你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。但当我拿起这本书时，却觉得你无比熟悉而亲切。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：我们喜欢北大，而你就送我们一本关于北大的书，也许你把我们都当成一群追梦的孩子，而你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离梦更接近一点。但是，你难以想象，这本书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波澜。在学校很少有老师喜欢我。三年中认识我的老师也不过一二人，而这一二人也只记得某某人这个名字，而不是我这个人。在学校我几乎不招呼老师，因为师德有问题的老师为我所鄙视；而在喜欢的老师面前我往往是手足无措。当他们快要经过我的身旁时，我很紧张，把头埋得很低。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好学生，没有资格叫他们，甚至怕亵渎了“老师好”这三个字。当他们走远时我才会抬起头望他们的背影。我心里想，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，也许也是上述的表情。所以当时的心情绝不是感动二字能概述的。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人在自杀前仅仅因为想起美术老师对他的赞扬的几句话，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，决心重新生活。以前总怀疑它的真实性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有时真的只是对别人说一句话，做一件很普通的事，就能引起这个人的变化。就像你对我，你让我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我的学生（看来这个人现在



当教师——作者注)。做你的学生真好，他们时常会被感动。这样他们的心灵会永远充满爱心与感激。

我立刻给他回了一封信：

你的来信让我感动，字里行间充满了爱，不只是你我之间，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爱对待周围所有的人。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沟通。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沟通了。从信中看你现在是位老师。你说你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你的学生。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。在我看来，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、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，加以培育和升华，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。——按照我的人性观，人是善恶并存的。问题是我们要“扬”什么，“弃”什么。而善的激发，是需要一种爱心的。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，是自然的，用你信中的话说是毫不经意的，而不是一种着意的表演。而当下社会里，这样的爱的表演实在是太多了。你的来信引发了我的思考。谢谢。

这样的通信，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激励，相互间爱心的传递。想想看，作为一个教师，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和年轻人进行这样的心灵的沟通，那是一件多么幸福、多么美好的事情！



有时候教师只需要做一个倾听者

这里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。有一位辽宁的女孩，她父亲是一个工人，她的母亲已经下岗。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，说：“钱教授我太痛苦了。我在学校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我学习非常好，但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没有关系，没把我分到重点班。我受不了了，我想自杀。”当我看到最后这几句话时，简直吓坏了，我想，这孩子真要自杀这怎么办？但是仔细一看，这封信是用了很美丽的信笺写的，这孩子如此爱美，大概还不会自杀。于是赶紧给她写信，安慰她，鼓励她，给她讲道理。以后这孩子几乎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，倾诉她内心的一切。就这么联系了很长时间，这里是我写给她的一封信：

这封信是用了很美丽的信笺写的，这孩子如此爱美，大概还不会自杀

你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。因为事情忙，前不久还外出开会，没有及时给你写信，请原谅。谢谢你对我的信任，随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，讲给我听。我也愿意这样听你讲话。只是有时不能立刻给你回应。不过请你相信，远方有一位老人，总是在倾听，并且理解你。

这件事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：她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地来信？我由此联想到现在的青少年，特别是到了中学阶段他的内心有一种倾诉欲望。可惜的是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



老师，常常不愿意倾听他们讲话，倾听他们的心声，这个时候就只能到我这样一个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老人这里倾诉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我愿意听她的；第二，我绝对尊重她，并且替她保密，我不会因为她和我说了什么话，而去损害她。这样她就有一种信任感，安全

感。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办法，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青少年，我不可能每天都这样给他们写信。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教育，如果她的家庭、她所在的学校，有父母、有老师愿意这样倾听，她就不必千里迢迢地向我倾诉。这正是教师、家长，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——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倾诉的职责。其实孩子把心里话向你讲，讲完了，把郁积在心、解不开的许多情绪发泄出来了，心里舒坦了，该怎么做，她自己就明白了，并不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指点什么，教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简简单单地扮演这样一个倾听者的角色。这说起来简单，却也不简单：因为它需要一颗尊重学生、理解学生的爱心。

这个辽宁的女孩，后来高中毕业了，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，而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。我没想到，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她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见我一面。她那个失业的母亲也跟了来，但是高低不肯进来。我和这



个孩子谈了一个上午，然后送了一大批书给她。我想这个孩子要见我，也是圆她的最后一个梦。后来那个孩子再也没和我通信。这样我反而放心了：大概上了大学后，找到自己的路，就不需要再向我这个老人倾诉了。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；而她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幸福：有这样一些纯洁的孩子，他们信任你，愿意向你袒露内心，你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，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谈，这本身就实现了一种价值，一种生命的价值，而且是教师所特有的。我与这个女孩子通信的价值绝不亚于我的学术写作的价值。至少说在我心目中它们是同等的。——我的学术写作追求的也就是这样的心灵的交流。

我与这个女孩子通信的价值绝不亚于我的学术写作的价值

教育是师生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

这就说到了青年学生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意义。我的研究从来不能离开年轻人，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面对年轻人说话。提笔写作的时候，我的面前始终闪烁着年轻人渴望的眼光。同时年轻人也参与我的写作。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种习惯，就是我很喜欢和学生聊天，我的研究课题不是我一个人苦思冥想出来的，常常是在客厅里面，和学生聊天中产生一个想法、一种思路，然后去研究。在思考过程中，只要有一个学生或年轻人到我家，我就会滔滔不绝地和他讲我在研究什么；在讲的过程中学生或年轻人会作出反应，提出意见，也就会深化我的思考。以后，再来一个人，就再讲，再讨论，思考又深入一步。如此反复多次，



谈得差不多了，研究的思路也自然成形，就可以写出来了。所以说我的学生、年轻人是参与了我的写作和研究过程的。在我的著作里，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家的观点，而是大量引用学生的一些曾经启发了我的思考的观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在我看来，教育绝不是单向的，绝不是教师单方面地输送给学生。当然主导是教师，但同时学生的反馈，学生提出的问题，本身都会引发教师的思考。学术研究如此，上课也如此。我这次到附中来上课，上了一个多月，尽管我对鲁迅作品已经非常熟悉，但备课时，都要重新看，因为心里存有中学生这样的对象，重读的时候，对作品就有新的发现，产生新的解读。这种解读实际上有对象存在的潜在因素的影响。另外在和学生交谈、在批改学生作业时，学生所提出的问题，以及他对问题的思考，都会引发

